

## 成為印尼人 1：機場經理

綠色護照封面有一隻展翅昂揚，用金線細細描繪的鷹。鷹的腹部掛著一個盾牌，上面有鏈環、巨樹、牛頭、稻穗棉花，以及居中的星星五種圖案。護照 1986 年 12 月 12 日從曼谷發出，照片中的我剛滿 12 歲，國小畢業將要升國中。還有髮禁的年代，升上國中剪頭髮是一件大事，耳下三公分，髮際不能碰到衣領，我天生自然捲，半長不短的西瓜皮，讓髮根的捲度更加張牙舞爪，鋼絲頭、米粉頭、爆炸頭是國中三年如影隨形的綽號。照片中的我有著一股哀愁的預感，眉頭皺起，嘴角下垂，眼神陰鬱，為了拍證件照不斷用定型液固定住額前的那一片「鋼絲」，不知怎麼地很有熱帶風情，像是叢林裡盤踞的藤蔓，帶著濕熱的沼氣。照片裡的人，就像是印尼人，護照更確立其身分，那是台灣還沒有大量引進印尼移工的八〇年代，父親帶著我們反向逆流而行。

父親花費大把金錢與精力，幫母親、姊姊、我都弄來一本印尼護照。辦護照前家裡有一股特別鎮重的氣氛，像是什麼正要發生卻還沒發生，暗潮洶湧正在底下醞釀著。父親要我反覆練習護照上的簽名，他先在一張白紙上寫上我的英文名字的草書體，師大英文語畢業的父親寫得龍飛鳳舞，好看極了，到我手上變成歪歪扭扭，飛龍落地貶為蟲蛇。父親很不滿意，頻頻用指頭彈奏我的太陽穴，練習再練習，直到辦護照那天，簽名畫押，我才如釋重負。三十年後，翻開早已失效的舊護照，歪斜的簽名沒有過度的雕琢，有種童稚的純真，不知為何，這簡單的簽名當時竟令我痛苦至此。

1986 年，父親年近半百，自考進華航後，因為不擅社交，長蹲基層，一直升不了官。在我小學畢業這年，父親迎來千載難逢的機會，華航雅加達機場經理的職位開缺，父親是印尼華僑，印尼文、馬來文、英文、中文皆精通，是最合適的人選。父親極力爭取這個職位，他在台灣職場水土不服久矣，能藉此把家遷回印尼，再好不過了。

機場經理與辦印尼護照這兩件事雙軌並行，1986 年底，我讀國中一年級，護照終於辦出來了，父親的升遷卻半夭折翅，學歷、語言與在地優勢，通通不敵華航職場如官場的人情紐帶。沒有關係背景，性格怯懦，總是低著頭唯唯諾諾的父親，使他不到 160 公分的身高更顯矮小，像是果戈里或契訶夫筆下那些卑微的低階文官，撐不起機場經理的門面。升官不成，又貶回貨運組，那是不需應對旅客的冷宮。父親從來沒調回位於南京東路的華航總公司，權力的中心，只有每年暑假帶我們回印尼探親，申請免費機票時，父親才會踏入那座高樓巨塔，同樣是鞠躬哈腰陪著笑，把應得的福利弄成上面賞賜的恩准。直到六十歲退休，父親每日清晨即起，五點半出門，趕第一班交通車到桃園機場上班。那個年代不叫桃園機場，而是中正國際機場，一如各地都有的中正路，姊姊讀的

升學名校，在中正紀念堂對面的中正國中，威權冠名如癌細胞滋長蔓生。

父親工作的機場，對我們並不陌生，每年暑假我們都要往東南亞，旺季出國拿免費機票常候補不上座位，機場成了我們漫長擱淺的潮間帶。父親滿腹苦水，皺著整張臉在票務櫃檯和同事交涉，母親看管一家笨重的行李，我和姐姐把行李手推車當滑板車，滿場飛奔玩耍。直到大學畢業後，我才學會怎麼搭火車，搭飛機是胎裡帶來，母親說她懷胎時我就搭飛機，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末尾，每年都要出國，現今想來在當時是不太尋常的一件事。桃園機場在 1979 年啟用，在這一年小幅度開放出國觀光（16 到 30 歲的男性除外，以觀光名義申請每年兩次為限），在這之前，僅能以就學、探親、商務等事由申請出國，且要經過經濟部、教育部或僑委會等主管機構核准，在 1972 年之前，出入境管制甚至把持在警備總部這樣的情治機構手裡。

七〇年代鎖國時期的家族旅行，香港、曼谷、吉隆坡、新加坡、雅加達都有我們一家的蹤跡，父親以探親名義，獲得僑委會許可才能出去。家族旅行橫跨戒嚴與解嚴，在孩童的心中絲毫不覺那條紅線的分別，只記得小時候出國，機場還沒有可以掃描行李的 X 光機，檢查行李大費周章，需要把行李箱開膛剖腹完全打開，裏頭的衣物全部掏出，一家大小的內衣褲就這麼坦露在海關以及其他旅客面前。出國旅行不易的年代，比照過年需穿新衣，連內衣褲也須全部換新，以免破洞泛黃引起旁人恥笑，方能「體面」地過海關。回程時大人總會趁著在香港轉機時停留一兩日，採買一些雲南白藥、白鳳丸等「匪貨」，在西環掛著風乾鯊魚翅的南北貨店鋪，母親總會再多買幾盒椰子糖或核桃棗泥糖，將糖果紙剝下，拿來包那些匪貨，回台灣轉賣賺取差價。

到了八〇年代初期，出國觀光的人數仍未突破 50 萬，1987 解嚴這年已突破 100 萬。解嚴前一年的 1986 年，我獲得一本印尼護照，成為「印尼人」，卻因父親的升遷不利，逃脫回歸「故土」的命運。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電影《機遇之歌》，搭上火車或者沒趕上火車，命運從此分岔，每一種結局是偶然也是命定。車站、機場、碼頭時常上演悲歡離合，是命運輻輳地，拿著那本印尼護照出境，短期內不再回來，在另一個平行時空「她」的命運，會是如何？

小學剛畢業，喜歡《西遊記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記》還有亞森羅蘋、福爾摩斯，剛開始讀《紅樓夢》讀到黛玉葬花。將長於北回歸線以北的植株連根拔起，移植到赤道南洋，在蘇哈托政權禁止華語教育多年的印尼，拔掉中文，重新學習印尼文，取一個印尼名字，家裡有來幫傭打掃煮飯真正的「印尼人」。半路拾起的印尼文，能夠足以讓我日後當記者，成為一個寫字的人嗎？半路丟下的中文，停留在小學階段，我還能把那本《紅樓夢》讀完嗎？

移植失敗，植株留下，1986年秋天以後，我成為一個國中生，國文課本裡的八股選文令我興趣缺缺，很快地我就將目光轉往重金屬搖滾樂與好萊塢電影，迷上槍與玫瑰還有艾爾帕西諾，未完的《紅樓夢》要一直到大學讀了中文系才終卷。解嚴前一年的國中校園依然壓抑滯悶，感受不到任何外面街頭開始狂飆的氣氛。在以印尼華僑父親為首的小家庭，按先來後到的優先次序，比1949年外省人更晚到的「遲到的移民」，與台灣社會的脈動更是脫節。父親每天早起搭交通車去機場上班，1986年11月30日這一天，他必然感到不便，但他回家之後不曾提過一句。

1986年，解嚴前一年，滯留海外多年無法返鄉的黑名單，開始嘗試突破禁忌闖關，由前桃園縣長許信良打頭陣。11月30日，大批群眾為了迎接在海外流亡多年的許信良闖關回台，群聚在桃園機場外。許信良在1977年脫（國民）黨競選桃園縣長，獲得熱烈支持，為了杜絕行之有年的作票舞弊，不重蹈郭雨新落選覆轍，開票當天群眾主動監票，和選務人員發生糾紛，引發暴動，包圍、火燒警察局，史稱「中壢事件」。驚滔駭浪下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，1979年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因為涉嫌匪諜案遭逮捕，明顯是構陷入罪的政治迫害，許信良、施明德等人發起橋頭遊行聲援，是台灣實施戒嚴以來的第一次遊行示威活動。中壢事件的秋後算帳在兩年後，1979年許信良因為在上班日參加橋頭遊行，被公懲會以「擅離職守」為由，宣布休職兩年。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，身為雜誌社長，當時正在美國的許信良雖然躲過一劫，卻再也回不了國，直到1986年試圖搭機闖關。

警察得到風聲，在通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上，過境旅館前就先用拒馬和鐵絲網攔起，要出國離境的民眾，和機場內的工作人員，必須出示證件或護照機票，才能一一放行，提著行李的旅客必須提前下車，拉著笨重的行李走好長一段路，才能抵達機場大廳。封鎖造成諸多不便，讓當日機場大亂。

那是我完全觸摸不到的時空，未曾聽聞的事件，從「戰區」回來的父親也不曾捎回一絲煙硝味。我重新補課已是2016年，在綠色小組的影像中看到鐵絲網另一邊的情景，那和父親平日工作場所—機場的冰冷禮貌有序不同。先遣隊伍從年底要競選立委的許國泰（許信良之弟）的中壢總部出發，人潮洶湧，敲鑼打鼓聲不絕，不說還以為是什麼廟會進香活動。大隊浩浩蕩蕩出發，當時已八十幾歲的余登發老先生，聽到當年危難中義助的許信良要闖關回來，特地從高雄北上，並堅持要以雙腳從中壢走到大園，老先生左右需要有人攙扶，走了三個多小時才到拒馬前，迎接他的是強力水柱，眾人紛紛以衣物或旗幟遮住老先生，保護他不被水柱沖到。這張照片，很長一段時間都貼在綠色小組的工作室。

1986年9月底民進黨成立，年底的機場事件是反對黨成立後的第一場大型抗議活動。兩邊都在練兵，反對黨這邊是全省各地動員齊聚桃園機場，賣香腸和魚丸湯的都來了，擴音器與宣傳戰車開到拒馬前，輪番上去宣講；當局這裡派出的是真戰車，影片中一排裝甲戰車，上空還有直升機盤旋，公路下方的河床長滿芒草，給人一種肅殺的氣氛。偶爾有班機的起降，群眾的情緒隨著飛機起降高低起伏，每降落一次就以為是許信良回來了。

1986年的冬天，氣候嚴寒，高速公路上風勢強勁，毫無遮蔽，被水柱沖過的人群衣服濕透，在風中簌簌發抖，隨之而來的還有漫起一片白霧的催淚瓦斯，僵持在鐵絲網前，群眾不退，隔著拒馬，群眾唱〈黃昏的故鄉〉，警察放愛國歌曲〈先總統蔣公紀念歌〉；群眾丟石塊過去，警察也丟石塊過來，但是晚上播出的新聞沒有水柱棍棒催淚瓦斯，只有「暴民」丟石塊。

從直升機上灑下長條的傳單，形狀像廟裡的籤詩，上面寫「不要被利用，趕快回家」的心戰喊話。綠色小組的麻子說：「這一定是事先印好的，為什麼說國民黨這次準備好了，我跑街頭運動從來沒看過這種從天而降的傳單。他們灑傳單，我們就對著直升機比7，那是菲律賓群眾抗議馬可仕，讓他下台的手勢。」

1983年，菲律賓反對黨領袖尼諾伊·艾奎諾遭到暗殺，引發廣大民怨。馬可仕總統宣布將大選提前於1986年2月舉行，他靠著作票舞弊險勝，2月25日就職日當天，在馬尼拉市中心超過兩百萬群眾集結抗議，促使馬可仕下台，倉皇逃離出境。馬可仕在1972年至1981年實施十年戒嚴，鎮壓異議人士，終被推翻下台。同在東亞的台灣、韓國這兩個威權政體，戒嚴維持更久，受到菲律賓革命成功的牽動，也紛紛爭取民主化，壓力鍋瀕臨爆炸邊緣。

距離菲律賓的二月革命不遠，1986年5月19日，鄭南榕等人發起「519綠色行動」，要求停止戒嚴。原本遊行要從龍山寺出發，最後抵達總統府，在出發時就被警察團團圍住。麻子回憶：「警方用人牆把群眾和黨外人士隔離。我扛著攝影機被群眾抬起越過人牆，蔡有全在裡面接應。那天下著不小的雨，他站在戰車上帶喊口號，漏電的麥克風像燙手山芋，他還搞笑說，勇敢的台灣人不怕電，馬上又被電得哇哇叫！」

蔡有全堅持「群眾路線」，在影片中他痛批反對運動不應該走菁英的代議士、議會路線。群眾路線的「群眾」到底是什麼？綠色小組的影片，讓我可以穿越時空，與群眾「相見」。群眾往往不是那些拿麥克風的，不是影片裡標上名字的，而純粹就是，鏡頭隨意掃到的路人。警察包圍遊行隊伍，外面又有更大一批群眾反包圍警察。群眾站三七步，在外圍用三字經ㄍㄟㄟ警察，一副流氓模樣。群眾下盤穩重，八字腿蹲踞在龍山寺圍牆的瓦簷上，一邊居高臨下偵

測，一邊牆裡牆外輸送飲料便當，宛如孟嘗君門下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雞鳴狗盜之徒。彼時龍山寺對面，一整排小吃攤還在，吃一碗藥膳土虱的群眾把筷子放下圍上來。彼時的警察穿軍訓土黃顏色的制服，戴鋼盔，就有一種憲兵上身的感覺，不像現在改成相對較親民的深藍色制服。只是記錄，不加雕飾的影片太好看了，除了街頭運動本身，八〇年代台北街頭的氛圍，行人的穿著，陽傘的樣式，公共汽車的笨重，以及，庶民的「臉孔」。這些臉孔，是我現在生活中很少再見到的。這是中南部做農的移民台北，成為市鎮小型加工廠的工人，棲居於三重新莊一帶，大概就像作家楊索或鍾文音在書中描寫過的父母。

第一代的移民者，融合著庄腳人的質樸憨厚，與大橋頭人力市場幹粗工活的生猛。那生猛只因搭火車從後站出來，首先遇上的，就是如湯英伸也曾遇過的職業介紹所，那樣人吃人狗咬狗天地不仁的新世界。第一代紮根下來，第二代、第三代的臉孔，逐漸被這都市文明現代性浸潤，馴化為我熟悉的文雅樣子。八〇年代解嚴前後，時代裡的粗礪臉孔，已不復見。

來自婆羅洲，在航空公司工作的父親，豬籠草移植過來，在八〇年代已馴化為一身西裝襯衫的文雅樣子。台灣八〇年代的民主進程與父親無關，與我們這個在台北的孤島家庭無關。父親每日勤勤懇懇上班，和「機場事件」擦身而過。父親毫不知覺他擦身而過的是什麼，他所工作的華航與機場，和東亞的民主進程有如蝴蝶效應般的牽一髮動全身。

1983 年被暗殺的艾奎諾，在桃園機場搭上的班機正是華航 CI811 班機。艾奎諾和許信良一樣，都是被迫流亡美國，千方百計要闖關回國的異鄉人。返鄉之路，艾奎諾先從美國來到台灣，住在圓山飯店裡，等得到馬可仕的安全「保證」，才搭機啟程。在馬尼拉國際機場，華航班機停妥，他走下階梯時被開槍暗殺，正中頭部。艾奎諾在離開台灣前曾舉辦記者會，開玩笑說他預備穿防彈衣，那麼殺手要射他的頭部才能讓他致命，一語成讖。艾奎諾遇刺，事後檢討是台北有人將詳細班機時間行程洩密，台菲之間諜影幢幢。1987 年，菲律賓民主化之後，為了紀念艾奎諾，馬尼拉機場更名為尼諾伊·艾奎諾國際機場。曾把許信良拒之門外的中正國際機場何時更名？直到 2006 年才更名為桃園機場，那是父親過世的前一年，他已老人癡呆，久未踏足曾經的工作地點。1975 年交通部民航局「用資紀念民族救星，時代聖雄故總統 蔣公」的命名從此走入歷史。

1986 年 11 月 30 日的桃園機場事件，群眾最終沒等到人，許信良在東京轉機時被擋住，滯留當地。12 月 2 日，許信良借道菲律賓，試圖二次闖關仍未果。三年後，1989 年許信良從中國搭漁船偷渡回台，上岸後被當局以叛亂罪判刑 10 年。不是 1987 年 7 月就解嚴了？還有叛亂罪？「懲治叛亂條例」在 1991 年 5 月才廢除，這是條白色恐怖時期最常用來判處政治犯死刑的罪名，刑度極重，

可判處死刑之罪名共計 30 種，包含 7 種絕對死刑。

奧德賽艱難返鄉，迎接他的是叛亂罪。機場事件中，用〈黃昏的故鄉〉對抗〈先總統蔣公紀念歌〉，在這個以中正命名的機場有其特殊寓意。在台灣民主化轉型階段，那麼父親的認同呢？記得他要我們學唱印尼國歌，曾改編成中文歌曲的〈梭羅河畔〉也是他的鄉愁。1991 年長榮航空開航前，華航是國內唯一一家航空公司，寡占令其收益豐厚。父親除了薪水還有一年到頭發放的獎金，他把那些獎金通通拿來辦全家的印尼護照，和中華民國護照同樣是墨綠色，那隻展翅昂揚的鷹比黨徽圖案生動許多。鷹肚腹處盾牌上的五個圖案，小時候我從來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後來才知那是印尼建國五原則（Pancasila），置中的五角星星是第一原則：必須有宗教信仰，信奉獨一無二的神明。

蘇哈托在 1966 年上台後，勒令國民不可不信仰宗教，需從四大宗教中（穆斯林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）自選其一，否則就會被視為是無神論的共產黨徒。

記憶裡父親自始至終抗拒任何宗教信仰。2007 年秋天父親過世時，我們還苦惱了一陣，身後事該以何種宗教儀式舉辦，想到他極厭惡線香金紙的味道，基督教儀式大概還堪「忍受」。喪禮這天，牧師遲到很久，匆匆趕來滿頭大汗，虛應故事敷衍了事，當他一邊抹汗一邊說這位弟兄已去到天主的懷抱，我不知是想哭還是想笑。這一刻，父親第一次符合護照上的那顆星星「必須有宗教信仰，信奉獨一無二的神明」，成了實實在在的印尼人。